

← (上接4版)

记》载：

千福寺，在安定坊，会昌中毁寺后却置，不改旧额。寺额上官昭容书。毁寺后有僧收得，再置却悬之。中三门外东行南，太宗皇帝撰《圣教序》，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。

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所译的《心经》，是佛经中最短的一部经典，全文只有260字。虽然短小，却要言不烦概括了般若部的基本要点，是大乘佛教纲领性文献，用最简洁的语言讲解了大乘佛教关键内容。

《心经》的传递、翻译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佛学公案，过多讨论已溢出本文。简而言之，《心经》比较重要的汉译本有七个。根据林光明的统计，本世纪以前的中外《心经》译本共有184种。称得上是佛教经典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佛经，可谓人人皆知。汉译本中流行的最广为人知的是玄奘《心经》。

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由玄奘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终南山翠微宫译成。该经只有正宗分，无序分与流通分，故学界以“小本”称之。不过，人们现在所见的玄奘译《心经》最早的是汉文译本，梵文本从结构到内容更像是从汉文本回译，而非梵文原典。

《心经》的末尾记录了五位润色官人名：于志宁、来济、许敬宗、薛元超、李义府等奉敕润色。

佛经翻译是一项集体行为，由于佛经翻译规模盛大，朝廷对佛教经典翻译的介入也是空前的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译场设置专门润色官员，参与翻译活动。从唐太宗到高宗借由译经活动，控制佛教上层，尤其是佛经的翻译必须在政治上正确。润色官员的职责是：“有不稳便处，即随事润色”。稍有不妥，便由儒臣随即进行润色，以保证官方的旨意得以贯彻。

《心经》的翻译，原本有鸠摩罗什译本，玄奘译本在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已译完，似乎并不存在要若干大员领衔润色。那么，在咸亨三年所立的《集王圣教序碑》中《心经》尾列一千润色官员，实际有着不同寻常的目的。于志宁等人题衔奉敕润色，是高宗朝一个著名的佛教事件，其缘委复杂。简单而言，唐高宗将太子忠改封为梁王，立武则天子李弘为太子。显庆元年二月在玄奘所籍慈恩寺设五千僧斋为新太子祈福，命朝臣行香。黄门侍郎薛元超、中书侍郎李义府向玄奘请教古来翻译仪式，玄奘的回答是：汉魏以来有君臣赞助、文臣监阅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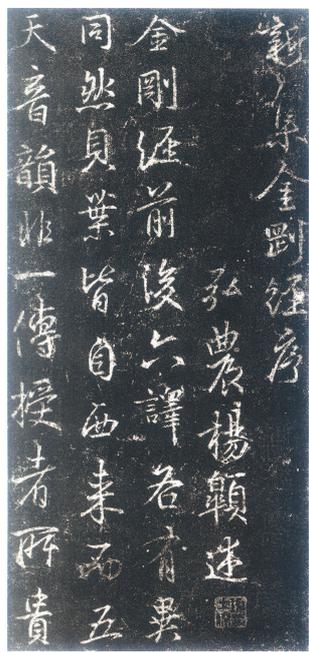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7 《集王羲之之书金刚经·新集金刚经序》

辑制度，今独无此。

薛、李二人奏明皇上后，遂遣大臣共监译经，由中书令崔敦礼宣敕，命于志宁等七人“时为看阅，有不稳便处，即随事润色”。关于大臣共译经，以往人们以为是出自玄奘请求，意在挟官方势力，以杜绝佛教内部其他宗派的攻击。

大臣“监共译经”，儒臣参与是出于玄奘的请求，还是高宗的本意，或许两者一拍即合。

清人王昶批评道：

沙门辈惟知官阙为荣，并举而列之，岂复知有所好恶去取哉。且此碑所列止六人，而大奸居其二，元超亦奸党也。君子少而宵人多。观此又可知佛教之庞杂。

《心经》被嵌入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的举动，引起后世许多人质疑，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佛教经典众多，为何独将《心经》收入其中。

很多迹象表明玄奘本人非常喜欢《心经》这部短小的经文，甚至有人以为为表达《心经》的正式合法地位，他本人又将《心经》回译成梵文。《心经》问世后这种功用业已发挥，《集王圣教序》使《心经》获得一次普及机会，使它有可能会置身于喧嚣的公共建筑空间之中。

不过，《心经》置入碑石之中，仅从书法角度也使一些学者产生某种困惑，风格上与前稍有差别。翁方纲觉得，后人讥之院体，当与后半段《心经》有关，可能另手所集，非怀仁所为。

北宋王朝被认为是金石收藏传统兴盛的开端，而收藏典范的建立与北宋初年整个社会的嗜古风尚有着密切的关联。《金石录》中所记《集王圣教序》和《历代名画记》中信息一样，并无《心经》的记录。

1973年8月在加固碑林巨碑《石台孝经》地基时，在碑背面石缝的槽下发现一幅迭折方整的《集王圣教序碑》整张拓片。据说这些遗物的放置应与金代正隆年间《石台孝经》的修整有关。大约在金代《集王圣教序碑》已入文庙碑林。

骆天骧的《类编长安志》提供了可靠的信息：

《唐三藏圣教序》，唐太宗御制，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。时玄奘自西域取贝叶以还，诏译于弘福寺，既毕，太宗为之序，高宗为皇太子，又为序记，并译《心经》一卷，以咸亨三年十二月立。（略）今在文庙。

《集王圣教序碑》此时已存西安文庙，并且明确称有《心经》一卷。现置碑林《集王圣教序碑》内容与之完全一致。

《集王圣教序碑》在唐及以后的影响

在怀仁集王羲之行书的影响下，后世鸠集王字构拟碑文成为一种风尚。《宣和书谱》记载，集王羲之书共有十八家。据宋及后人金石著述载录，唐人集王羲之书碑石，大约有十九通。有确切纪年的集王字碑，从乾封二年（667）到大和六年（832），约160多年的时间，其中有12通集中在乾封至天宝这100年的区间；从内容上来看，15通与佛教寺院或人物有关；集字者都是王字的膜拜者，如怀仁、行敦、卫秀、胡英、胡沛然、唐玄度等。

集王字者，终其一生熟习王字，技法娴熟，仅依书写表现而言，显然是王字衣钵的继承者。然而世俗社会并不依照书写者的相似程度而确立与王字之间的关联。仿效者以凡人心境所追摹的形似，在士大夫的目中终逃不脱邯郸学步的窠臼。

翰林待诏是唐代围绕在皇帝周围的专业书法家。根据《集王圣教序碑》（图7）后进经状所言，由翰林待诏唐玄度“翻集晋将军王羲之书，至大和六年春，功毕”。最后用“唐玄度模集”。“翻集”、“模集”是唐玄度集字的方法。最可关注的是唐玄度集字所使用的时间。《金刚经》约有五千多字，文字量差不多近怀仁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的三倍，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。或许，在《集王圣教序碑》集字过程中怀仁使用的工作量，没有后人估计的那样费时多年，借助这个案例，我们也可推测怀

仁集书时所费的大致时间。

奉敕集字，作为一种书法形式，同时也代表了某种特定人群的偏好。此时，集字在技能已无任何障碍，并且短时间内可以完成，表明翰林待诏日常工作中对内府中王羲之法帖熟悉程度很高，这种情况无论对集字还是自书都是有利的。唐文宗要求以集字的形式立碑，显然代表了皇室对王羲之字的传统尊崇和品位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事件。

对王羲之字的推崇是李唐王朝自唐太宗以来所建立的传统，虽然王字的门类繁杂，但怀仁以来的集字体系却表现出高度的统一。从《集王圣教序碑》到《金刚经》，甚至宋代的《绛州夫子庙碑》，一脉相承，辨识起来毫无困难。

自从《集王圣教序碑》树立以后，一种以王羲之行书为名的书体颇为流行，以集字模写方式成碑在释教领域亦有所传承。已经发现皇室成员、翰林待诏的行书碑石书写风格也与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相近。类似的书法风格在宫廷及专业书法家内部相袭，两者的关系或表明他们深受一套技法的影响。有学者研究相传出自专业拓书人赵模的《千字文》，以为是一模习王羲之行书的专业书法机构的书法教材。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的字样来源或主要来源，也是《六译金刚经》的字库。盛唐以后翰林待诏们以临摹此类风格书迹为主，形成风格明确的书体，也明显有别于同时期朝廷其他官吏的书风，被士大夫称俗，号“院体”。这样来说，并非表明以《集王圣教序碑》为代表的书体，对世俗社会完全没有影响。

北宋建立的最初百年，整个社会的书法水平被认为是有所下降。类似的焦虑在欧阳修等文化领袖们身上不止一次地表露出来。和欧阳修经常讨论这一问题的就有蔡襄。宋太宗也不能坐视书法相较前朝的衰落，设置御书院以延揽书法人才。

唐时皇室、翰林待诏多习“二王”书，其实多借宫廷收藏方便，并有一整套研习方法。五代战乱，藏品四散。宋初的翰林待诏们沿袭原有传统，被世人称为以院体相传，“书体轻柔”是对院体书迹一般性的批评意见，竟称“凡诏令刻碑，皆不足观”。其实以传世的宋初翰林待诏们书写的碑石，也没有一般士大夫所说的那样不堪。

北宋晚期黄伯思，将翰林待诏书体风格归结为多学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的结果：

然近世翰林多学此碑，学弗能至，了无高韵，因自目院体。

并且觉得并非碑中字俗，而是学者自俗，当然他以为非深耕书学者不足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。在士大夫的目中，翰林待诏所学的书体代表着官方公文流行的书体，而这些人本身的文化素养不高，并且是职滞下流的伎（技）术官。他们上升的空间极为有限，多年后才能出职。并且以御书院待诏身份出职者不得为文职，只能出武职，宋人重文轻武。以书艺为业者，被排除在清流士大夫之外，可见社会观感中翰林待诏的地位。

贬低职业书法家的最好策略就是将其打入院体的行列，相反另一些书家则被抬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隐含在这些论述背后的是士大夫阶层所占据的文化优越性，有别于技能娴熟者的平庸。在世人论述当代草书诸家时，曾明确指出，受院体影响的草书完全被排除在外，或者说书院体者兼习草书的人并不在士大夫眼帘之中。

宋太宗所倚重的王著，能补智永和尚真草《千字文》数百字并刻石。王著最大的贡献是编辑《淳化阁帖》。所谓院体并无统一标准，并时常处于变化之中。太宗时因觉得院体书者平庸，而被特意引入的王著，多年后也被归入此列并影响深远。仅仅时过百年，时人对王著的评品已在天壤间。值得关注的是北宋时期著名文人欧阳修、黄庭坚等人虽然不像周越那样对《集王圣教序碑》有过评价，但并不表示他们对此毫无兴趣，在另外的集王书材料中我们可获得他们的价值取向。虽然欧阳修也认为卫秀善于模书，他所自称的集王羲之书而来也可相信。但可取之处无多，学书者皆称出自书圣，而未必与其相同。孙过庭所谓“差之一毫，失之千里”就是同样的意思。黄庭坚用优孟模仿孙叔敖，楚王以为是孙叔敖复活的典故，来说明集书与原作、形似与实质之间的关系。

至此，我们已经大致习惯了评品者的逻辑结构与转折。集模者的王字与传世王帖相较，有的已达“纤微克肖”的程度，只是临习者未能至某种境界，即使形似克肖者，也徒具外形。虽然我们以简单的视觉形象判断，苏轼、米芾、黄庭坚的书法，并不比唐宋间所谓的“院体”更接近传世的王羲之法帖书风，但书法所崇尚的高级阶段从来不以形似为指归，尚韵这种看似虚幻的目标才是士大夫的悬的。黄伯思指出，因院体“了无高韵”，“故今士大夫疏此者少”。这种偏见传承有序，从唐朝吴通微、吴通微时代已经

(下转6版) ➔